

# 高齡社會的家庭代間關係與老年照顧

林如萍

## 壹、前言

隨著平均壽命延長、再加上少子女的趨勢，家庭的組成與結構也隨之改變。越來越多人在生命歷程中可能經歷三代或更多之家庭結構，家庭的世代數增加、但各代人數卻下降，家庭結構往「垂直化」發展（Vertically Extended）也呈現出家庭組成「頭重腳輕」（Top-heavy）的現象。再者，肇因於離婚、再婚等家庭的組成多樣性，多世代家庭中不同世代之間的互動關係日趨複雜，代間關係成為高齡社會關鍵的家庭議題。家庭中代間關係的重心是親代與子代的連結，而多世代家庭中除了父母與子女亦可能包括「祖父母-父母-孫子女」三代關係，因此，在高齡社會中，對於家庭的討論應超越「核心家庭」的視角，以多世代觀點探究家庭中不同世代的互動關係。

就華人家庭中代間關係的討論，由

傳統「奉養」的字義可以發現：十分強調代間單向性、上下依賴的關係。事實上，代間關係並不僅是單向的扶養關係，而是涉及了對規範責任的認知、代間情感以及資源移轉和互惠交換。就家庭代間關係的研究來看，多數研究應用「代間連帶理論」的概念，探討代間關係的不同面向：包括了代間接觸、代間財務及勞務的交換、孝道規範以及代間情感等；並且，聚焦分析代間規範及代間情感，對家庭不同世代之間相互支持的關聯性。期望能完整地描繪隨著生命發展階段，自子女年幼開始至子女成年、父母衰老，家庭中不同世代由「依賴」、「獨立」而「互賴」的動態互動歷程。除了探討家庭中的代間關係，相較於前述以「微視觀點」：將「世代」定義於「具親屬血統之後裔」，關注家庭內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或孫子女之間的互動。另一方面由「巨視觀點」切入，以「年齡、同齡群（cohort）」定義「世

代」，由「年齡階層」的觀點出發、關注「世代公平」，討論社會政治等層面的議題（例如：福利資源在不同世代的配置）。對「世代」的不同定義，產生了微視及巨視兩種研究取向，然而，微視環境之家庭代間關係與巨視環境中的福利體制，二者並非是截然無關的，福利政策傾向劃分出「國家」及「家庭」的角色界線，因此，福利政策對於家人關係及行為便會產生影響，然而，不同的社會文化規範卻也是影響福利政策之關鍵因素。過去「微視」與「巨視」觀點對於代間關係議題的討論向來經渭分明，近年，不論是老年學、家庭社會學及社會福利等領域的學者均主張：研究取向應結合「微視」與「巨視」觀點，以釐清兩者之相互關聯。本文綜整一系列有關家庭代間關係及老年照顧的相關研究，首先分析高齡社會中家庭三代之間的代間關係樣貌，並進一步聚焦於老年照顧議題，探討臺灣民眾對於福利國家政策的態度、老年照顧的期望，以及家庭代間關係對於個人態度的影響，以期於福利政策辯證中提供本土之思維觀點。

## 貳、高齡社會的家庭代間關係： 多世代家庭的代間支持

代間關係研究之歷史，可追溯自1943年Parsons一篇有關美國親屬關係

的論述，主張：都市化、工業化社會中，核心家庭在地理和經濟上與親屬隔離。此一「孤立的核家庭」說法，引發了社會學界熱烈的討論，研究由家戶結構、居住地接近性、代間接觸、代間財務及勞務交換等來加以論證。其後，研究者進一步探究：為什麼代間的連結得以持續？Bengtson等人提出「代間連帶理論」（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Theory）主張代間關係是多面向建構，包括：代間規範認知、代間情感等「認知—情感」因素為「潛在連帶」（Latent Solidarity），以及「外顯連帶」（Manifest Solidarity），包括：代間相互支持協助等行為，並且，潛在連帶具有促使代間外顯連帶的力量。換言之，對代間規範的認知程度及代間情感連結，會影響家庭不同世代之間的相互支持、協助（Silverstein & Bengtson, 1997）。隨著高齡社會老年照顧議題興起，有關多世代家庭的代間關係，多聚焦於討論家庭中不同世代的支持交換。

就多世代家庭的代間關係來看，處於三代之間的「中間世代」被稱之Janus世代（Hagestad & Herlofson, 2007），Janus是羅馬神話中的神祇，被描述成有前後兩張面孔、望著過去和未來。Janus世代同時「為人子女」亦「為人父母」，處於三代之間的中間世代在家庭中「承上啟下」，可說是「關鍵世代」。林如萍、黃

秋華（2017）運用《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》（以下簡稱「社會變遷調查」）第六期第二次調查「家庭組」資料（章英華、社素豪、廖培珊，2012），針對處於中年階段的中間世代分析三代家庭的代間關係。林如萍等人的研究聚焦於中年人和「上一代」（老年父母）及「下一代」（成年子女）之間的代間情感、衝突，以及代間財務、勞務支持等互動關係。研究結果指出：中間世代與老年父母、成年子女的代間互動，相較於與「上一代」老年父母、中間世代與「下一代」成年子女的情感較佳但衝突也較多。進一步，將家庭中三代之間經濟及勞務支持的提供/獲得，以類型分析策略（Latent Class Analysis, LCA）分析多世代家庭三代之間的支持交換類型，結果指出：臺灣家庭三代之間存在「由下奉養型」、「支持上下型」、「向上反哺型」及「低交換型」等多樣的代間支持交換類型。近四成的中年世代是：主要由成年子女提供金錢及勞務協助的「由下奉養型」；超過三成屬於「支持上下型」，中年世代既提供老年父母支持亦提供成年子女協助；「向上反哺型」（6.03%）的中間世代是獲得成年子女勞務協助，同時也提供老年父母金錢、勞務支持，且提供老年父母支持是四類型中最高的；而三代之間的支持交換皆低的「低交換」占24.11%。進一步，就年齡階段來看：40

到54歲的階段，有近半數的中間世代屬於「支持上下型」，確實是多世代家庭中的關鍵世代。

由林如萍等人（2017）的研究結果來看，臺灣多世代家庭的代間支持交換樣貌與西方研究主張的「零和現象」（Zero-sum Phenomenon）—中間世代提供老年父母及成年子女之支持存在競爭關係，家庭中不同世代存在「世代資源競爭」之假設不同。同時，代間支持交換會影響中間世代的生活福祉，「由下奉養型」者生活福祉相對最佳，「支持上下型」之生活福祉則最低。此一結果呼應了華人傳統文化的「積穀防饑，養兒防老」概念，家庭中不同世代之間強調跨越生命歷程時序性的「投資—回報」交換，因此，當家庭中的中間世代為「由下奉養型」生活福祉最高；相對的，「向上反哺型」及「支持上下型」的中間世代，雖然盡了為人子女反哺之責，卻未得到成年子女回饋、甚至仍須提供成年子女協助，因而生活福祉較低。隨著高齡、少子女的趨勢，由臺灣家庭的代間關係來看，多世代家庭將面臨子女數、手足數下降，但老年世代增多之代間支持窘境，中間世代的處境亦可能隨之越來越具挑戰。因此，相關之福利政策論述應超越核心家庭的思維，擴及多世代家庭並關注中間世代的處境。

## 參、照顧老人？照顧小孩？！ 高齡社會中「家庭」與 「國家」的責任分工

有鑑於老人棄養之社會問題，2011年11月，立法院初審通過《子女奉養父母法》草案，參考新加坡的《雙親扶養法》，主張立法規範：子女若不扶養父母，經法院核定發出「扶養命令」就強制以扣薪水的方式來支付。針對被稱為「不孝子條款」的立法，社會意見不一、最終並未通過。同時，內政部為了鼓勵生育，針對雙薪家庭提供托育補助，臺北市於2011年提出「助妳好孕」政策發放育兒津貼，其後許多生育、育兒補助政策陸續推出。綜整前述，「不孝子」條款背後所隱藏的問題關鍵是：成年子女對老年父母的奉養、家庭的老年照顧功能是否已經下降？在高齡及少子女的人口趨勢下，人們對於家庭「養老」、「育幼」功能的態度，以及對於「國家」的角色責任看法又如何？十分值得探究。

Lin和Yi（2019）以2011年「社會變遷調查」的「家庭組」資料（章英華、杜素豪、廖培珊 2012），分析臺灣民眾對於「老人照顧」及「兒童照顧」，「家庭」與「國家」責任分工的態度，以及家庭代間關係對於人們態度的影響。調查中的題目是：「一般而言，你認為以下的事情是政府的責任，還是個人/家庭的責

任？」Lin和Yi的研究發現：就「老人照顧」與「兒童照顧」，臺灣的民眾對於「家庭」和「國家」責任的看法，不論是提供照顧協助或生活所需，人們的態度都傾向「老人照顧」的責任應由「家庭」與「國家」共同負擔。另一方面，關於「兒童照顧」，尤其是養育照顧小孩，六成的民眾認為：主要是「家庭」的責任（圖1）。整體來看，臺灣民眾傾向認為「兒童照顧」主要是「家庭」的責任。

進一步，Lin和Yi的研究突破福利政策相關研究多數僅關注「老人」或「兒童」單一政策的限制，整合「老人」及「兒童」照顧四個題目，運用潛在類型分析（LCA）的分析策略，研究發現：臺灣民眾對於「老人照顧」及「兒童照顧」、「家庭」與「國家」責任分工的態度可區分為四個不同的類型。將「家庭」（主要是家庭責任）—「國家」（主要是國家責任）視為連續光譜的兩端來看，四個類型分別是：第一個類型「家庭中心型」，一成五的民眾認為老幼照顧皆為家庭的責任；第二是「家庭育幼型」，超過四成的民眾認為：家庭的主要責任是照顧兒童，老人照顧則應由家庭與政府共同協力；第三是「福利協力型」，有二成五的民眾傾向由國家與家庭共同分擔老年及兒童的照顧責任；第四個類型是「社會養老型」，約一成五的民眾認為：老人照顧主要應該是政府的責任。整體來看，臺灣家庭照顧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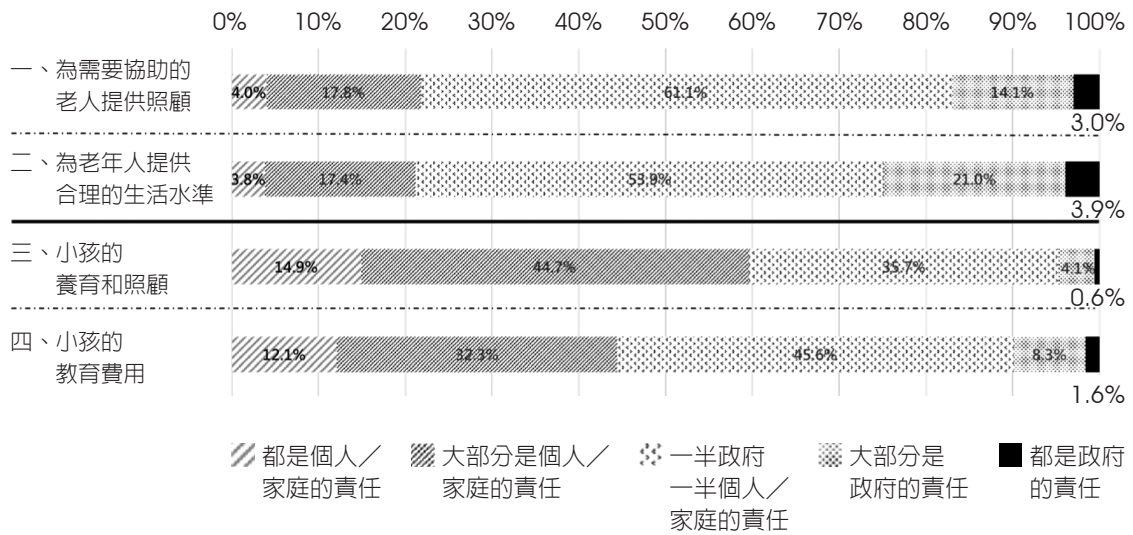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 「老人照顧」及「兒童照顧」責任的分工：臺灣民眾的看法

資料來源：作者繪圖。

功能呈現出「向下傾斜」的現象，民眾傾向「兒童照顧」為「家庭」責任，「老人照顧」則由「國家」負責。換言之，相較於兒童福利，民眾對於政府提供老年照顧福利服務有更高的期待。

由於「福利國家」的定義多元，且各國之社會、家庭文化存在差異，故目標的選擇與其優先順序是社會福利政策的重要議題。因此，研究多主張應深入探討民眾對於「國家」與「家庭」責任的看法並分析其對福利的態度。同時，過去的研究多是由「政治經濟模型」（Political Economy Model）提出觀點（如：Busemeyer, Goerres & Weschle, 2009; Street & Cossman, 2006; Tepe & Vanhuyse, 2009），主張：人們對於福利制度的態度

多因個人情境及需求，傾向於特定年齡團體（Age-based）的「利己取向」（Self-interest）。然而，此一觀點忽略了社會文化脈絡，尤其是華人傳統的孝道規範及反饋模式，可能產生的家庭世代連結及利他性對於個人福利態度的影響。由Lin和Yi（2019）的研究來看，「自利原則」（年齡群體受益者）及「情境原則」（女性多為照顧者、雙工作家庭之需求）等理論假說，雖部分獲得證實但卻不足以完全解釋臺灣民眾對國家角色的看法。臺灣民眾對政府在老人或兒童照顧的角色之態度，並非僅出於「自利」，不論家中是否有需要照顧的長者或兒童，人們越認同孝道規範、家庭代間互動關係越佳，則越傾向「家庭中心型」—視老幼照顧皆為家庭的

責任，證實了：孝道文化規範與家庭代間互動經驗，都是影響個人對國家福利態度的關鍵因素。

## 肆、誰來照顧我的老年？家庭代間關係與老年照顧期望

2017年的「老人狀況調查報告」顯示：65歲以上老人ADLs或IADL至少有一項困難者占28.16%，據此推估需要照顧或協助者為90.7萬人，其中主要由家人照顧者占6成7，以「兒子」占22.11%最多、「配偶或同居人」占21.53%次之，外籍看護工則占17.06%（衛生福利部，2018）。整體來說，臺灣目前多數的老人仍然由家庭照顧，但隨著老年父母與成年子女同住比例下降、婦女勞動參與率增加等影響，老人照顧的難題逐漸浮現。

為了因應高齡社會的照顧需求，2007年行政院核定《長照十年計畫》（簡稱長照1.0），推動長照業務。2015年臺灣通過了「長期照顧服務法」，主要的目的是：建立以社區為基礎之長期照顧服務體系，以期能夠針對有照顧需求者，提供具整合性與連續的服務。2016年12月行政院核定《長照十年計畫2.0》（簡稱長照2.0），並自2017年1月起實施長照2.0，目標是向前端銜接預防保健、活力老化、減緩失能，促進長者健康福祉，提升老人生活品質；向後端提供多目標社區式支持服

務，轉銜在宅臨終安寧照顧，減輕家屬照顧壓力、照顧負擔。除了推廣社區整體照顧模式試辦計畫、發展創新服務，並建構以社區為基礎的健康照護團隊體系，將服務延伸銜接至出院準備服務、居家醫療等服務（衛生福利部，2021）。

社會福利制度對於家庭照顧的影響，也可能會牽動個人對於老年照顧的期望。借鏡於同為東亞社會的日本來看，日本在2000年提出「從『家庭照顧』到『社會照顧』」（From Care by Family to Care by Society）的口號，啟動了長期照護保險制度（Long-term Care Insurance, LTCI）。LTCI計畫涵蓋了廣泛的社區護理和機構照顧服務，由「社會照顧」的概念出發，主張：老人照顧的責任不應該僅僅留給家庭，而應該由整個社會透過提供照顧服務來支持。此一政策顯示出：日本社會對老人照顧思維的根本性轉變，老年照顧政策對於家庭結構、婦女就業以及對照顧老年父母的態度都產生了後續影響。隨著臺灣的長期照顧服務的福利政策實施，臺灣的中老年人對於老年照顧的期望是否出現了與傳統華人社會「子代贍養、家庭養老」不同的圖像？Lin, Yu和Huang（2021）運用2016年「社會變遷調查」資料，分析中老年人對於老年照顧的偏好，並探討孝道規範、家庭代間關係與個人的老年照顧偏好之間的關聯機制。

Lin等人（2021）的研究策略，主要

是分析中老年人對於未來需要被照顧時的「期望方式」，意即是對於老年照顧的「偏好」。為了避免羅列各項照顧資源過於細瑣，或因中老年人無法清楚了解而無法有效測量，Lin等人的研究依據提供照顧的情境，將老年照顧的方式歸類為：一是，由華人社會中「在家養老」的文化傳統出發，在家戶中獲得照顧的「在家照顧」（Home Care），包括：「由家中一個人辭職或休學來照顧」、「雇用看護或外勞在家照顧」、「請鄰居朋友幫忙照顧」；二是，「白天送去附近社區機構照顧，晚上接回來」的「社區照顧」（Community-based Care）；第三是使用福利資源、機構為主的「全天都送去養護機構照顧」的「機構照顧」（Institutional Care）。研究發現：中老年人認為「自己年老到需要被照顧的時候，最希望獲得哪種照顧方式」？超過五成的中老年人期望「在家照顧」（56.4%），其次為「機構照顧」（22.6%）、「社區照顧」（21.0%）。整體來說，臺灣中老年人雖多數仍偏好「在家照顧」，但亦有超過四成認為「社區照顧」、「機構照顧」是理想的老年照顧安排。

由「需求」的角度出發，老人的健康狀況與其對照顧的偏好存在影響，但西方研究結果不一致。有研究指出：健康不佳的老人傾向於尋求正式照顧（Wielinket, Huijsman, & McDonnell, 1997）；但也

有研究發現：老人的健康狀況並未對照顧偏好有所影響（Pinquart & Sörensen, 2002）。Lin等人（2021）的研究也發現：健康狀況對於臺灣中年人的老年照顧偏好無關，此可能因研究對象，多數尚能保持基本獨立的生活能力，因此健康因素尚無效應。就家庭情境來看，Lin等人的研究指出，「子女數」越多的中老年人傾向家庭照顧，家庭成員的可用性與家庭照顧的偏好密切關連，此與西方研究的發現一致，其成因或可由「層級補償模型」（the Hierarchical Compensatory Model）（Cantor, 1979; 1991）的說法來解釋：子女數越多、非正式網絡能夠提供支持，非正式照顧是首選、對於正式照顧的偏好較低。中老年男性提供成年子女協助越多、女性與成年子女的衝突程度越高，則老年照顧傾向為「機構照顧」。家庭代間關係確實與中老年人的老年照顧偏好存在關聯，並且有性別差異。中老年男性提供成年子女的協助越多，卻越不期望「家庭照顧」，顯示出：中老年男性並非以「回報」的動機出發，反倒可能因仍需持續提供成年子女協助，而有「無法依靠終老」的疑慮，或由「利他」的動機出發，不忍未來加重子女負擔。而對女性來說，「代間衝突」是關鍵；中老年女性與成年子女的衝突程度越高，越傾向老年由「機構照顧」，兩代之間的衝突可能於年老接受子女照顧時加劇而引發的矛盾，是中老年女

性對於未來照顧的重要考量。除了家庭代間關係的影響，研究也證實了孝道規範的重要影響力，中老年人對孝道規範的認同也與老年照顧偏好存在顯著關聯，中老年人對於成年子女的孝道期待越低、傾向於「機構照顧」。

整體來說，臺灣的中老年人多數仍傾向於「在家照顧」（包括由家人或看護/外勞提供照顧），但也有超過四成的中老年人傾向於「社區照顧」、「機構照顧」。相較於傳統華人社會的「子女贍養、家庭養老」，臺灣中老人對於老年生活的想像，已經呈現出變化。但，中老年人對於孝道規範信念的認同仍然相當高，孝道規範的認同與老年照顧偏好存在顯著關聯，因此，中老年人對於老年照顧的偏好，若僅以老年世代「自主」意識的展現來詮釋，恐過於簡化。在社會經濟、福利制度及家庭的變遷影響下，中老年人心中的老年照顧藍圖，除了由對子女反哺義務的期望，亦可能是反映了：在家庭互動歷程中，中老年世代觀察子代的行為實踐（支持交換／衝突），相應地調整自己的期望；同時顧及子代負擔、能力等實況，所產生的「利他」權變。

## 伍、結語

2014年經濟學人（The Economist）以“A Billion Shades of Grey”為題，討

論：全球人口老化可能造成經濟發展遲緩及所得不均加劇等現象。日本的「下流老人」一書，封面斗大的副標題「即使月薪五萬，我們仍將又老又窮又孤獨」，老年貧窮的議題成為眾人的關注。當人們感慨，這是一個「『老』不起」的年代？！「誰來照顧我的老年」？便成為關鍵的議題。就國際趨勢來看，立基於對家庭重要性的認識，聯合國於1994年宣告為「國際家庭年」（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Family, IYF），並將5月15日訂為「國際家庭日」（the 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Families），每一年依國際情勢提出一個有關家庭的議題，呼籲各國關注並提出研究及政策加以因應。2014年為慶祝「國際家庭年」20周年，面對人口高齡化之挑戰，代間關係不僅攸關老年生活福祉、更是高齡社會的關鍵議題。聯合國於當年「國際家庭日」提出對各國政府的呼籲：強化「社會整合與代間連帶（Social Integr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）」，極力倡議各國應發展家庭相關政策以促進家庭之代間關係。

2004年，行政院為回應社會、經濟、文化變遷對家庭產生的影響，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通過「家庭政策」，基於支持家庭的理念，擬定五大政策目標，依各部會政策內涵分工推動，落實政府對於照顧支持家庭的承諾。繼之，考量人口與家庭結構變遷，歷經2015年修正、2021年提出之



最新家庭政策，揭示六大政策目標：一、強化家庭教育與性別平權，促進家庭正向關係。二、宣導家庭價值與多元包容，促進家庭凝聚融合。三、發展全生命歷程支持體系，促進家庭功能發揮。四、建構經濟保障與友善職場，促進家庭工作平衡。五、維護家庭適足住宅權益，提供家庭宜居環境。六、提升暴力防治與保護服務，營造家庭安全環境。其中，「發展全生命歷程支持體系，促進家庭功能發揮」此一政策目標特別提及：完備各生命週期之照顧服務與家庭支持系統，提供多元照顧模式，建構全人的家庭照顧機制；以及，發展以家庭為核心、社區為基礎之整合性家庭支持服務體系，透過公私部門、跨網絡合作提供服務，維繫家庭養育照護功能。家庭政策涉及內政部、教育部、衛生福利

部、財政部等17個相關部會，由各部會依政策內涵分工據以推動，以期落實政府對於照顧支持家庭的承諾。

本文透過綜整一系列以「社會變遷調查」的全國代表性資料所分析的相關研究，由臺灣多世代家庭的代間關係切入，並彙整有關老年照顧議題的重要實證研究結果，依據前述本文提出「個人—家庭—社會」整合模型（圖2），說明影響個人對於老年照顧態度的概念架構。整體來說，個人的需求、資源以及家庭的代間關係、孝道規範等，皆對人們的福利態度及老年照顧偏好具有影響力。家庭中的代間的互動經驗，包括：代間情感、衝突，以及相互支持交換皆是人們考量「家庭」與「政府」在照顧責任分工以及對於老年照顧期望的基礎。再者，中老年人對於老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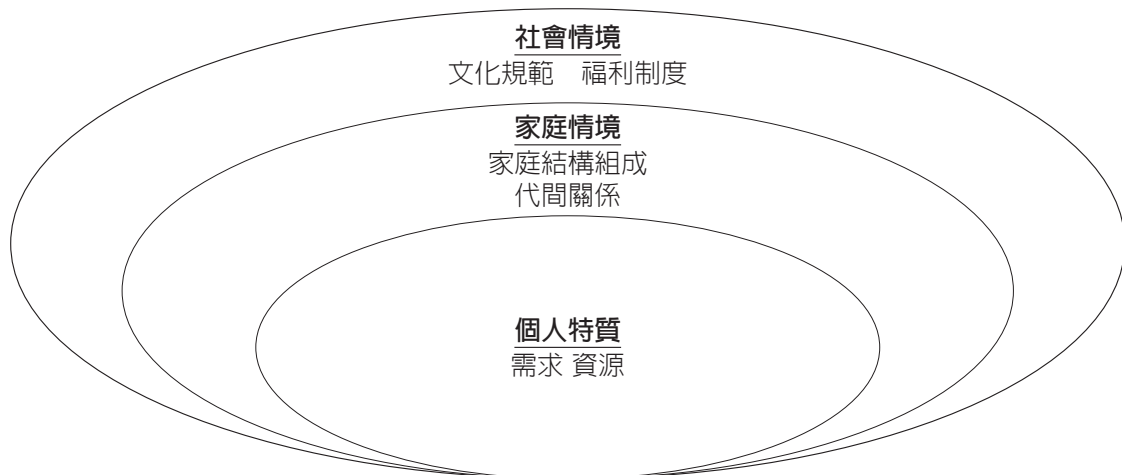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「個人—家庭—社會」整合模型

資料來源：作者繪圖。

照顧的偏好，不僅與「個人」因素及「家庭」情境高度關聯，更是鑲嵌於「社會」脈絡中，因此孝道文化規範、福利制度等皆可能與臺灣民眾的老年照顧期望存在關聯。

針對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（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, OECD）國家之長期照顧政策改革的分析研究，指出幾個各國共同的方向，其中之一為：發展符合「個人偏好」導向的長照體系（王卓聖，2013）。相關研究也證實：老人對照顧類型的偏好與他們以後的使用相關（Maloney, Finn, Bloom, & Andresen, 1996; Peek, Coward, Peek, & Lee, 1998），而是否考慮到老人的偏好，也會影響對老人被照顧的經驗和滿意度（Coulton, Dunkle, Goode, & MacKintosh, 1982; Reinardy, 1992）。因此，由中老年人的觀點出發，探討對於「老年照顧」的期望，當有助於對老年照顧議題的深入理解。再者，Pinquart和Sörensen（2002）針對美國和德國進行比較研究，分析中老年人對於未來照顧的偏好，研究發現：對於國家的福利政策的態度，確實影響老年

照顧的選擇偏好。歐盟有關老年議題的跨國研究計畫*Old Age and Autonomy: The Role of Service Systems and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Solidarity, the (OASIS project)*及*Survey of Health, Age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, (SHARE)*，一系列長期研究計畫的結果都指出：國家與家庭分擔老年照顧的「共同責任」，國家福利制度並不會削弱家庭的代間連帶，反倒因而可能「強化」了家庭的代間情感支持與自發性的協助（如：Brandt Haberkern, & Szydlik, 2009; Johansson, Sundström, & Hassing, 2003; Motel-Klingebiel Tesch-Roemer, Von Kondratowitz, 2005）。整體來說，國家政策和家庭相互影響是一個長期的動態發展歷程，因而，面對人口高齡的趨勢與照顧議題的挑戰，未來猶待持續進行研究觀察，以期作為相關政策規劃與執行之參考。

（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教授）

**關鍵詞：**家庭、代間關係、老年照顧、福利態度、高齡社會

## 📖 參考文獻

- 王卓聖（2013）。〈OECD 國家之長期照顧改革策略借鑒及啟示〉，《社區發展季刊》，141，45-60。
- 林如萍、黃秋華（2017）。〈三代之間：代間關係與中年生活福祉〉，《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》，

29 (3) , 1-34。

章英華、杜素豪、廖培珊（主編）（2012）。《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六期第二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》。臺北：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。

衛生福利部（2018）。《2017年老年狀況調查》。檢索自<https://dep.mohw.gov.tw/DOS/lp-5095-113.html>。2021/9/5作者讀取。

衛生福利部（2021）。〈長期照顧的整體政策藍圖〉。檢索自<https://1966.gov.tw/LTC/cp-5198-42393-201.html>。2021/9/22作者讀取。

Brandt, M., Haberkern, K., & Szydlik, M. (2009). Intergenerational Help and Care in Europe. *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*, 25(5), 585-601.

Busemeyer, M. R., Goerres, A., & Weschle, S. (2009). Attitudes towards redistributive spending in an era of demographic ageing: The rival pressures from age and income in 14 OECD countries. *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*, 19(3), 195-212.

Cantor, M. H. (1979). Neighbors and friends: An overlooked resource in the informal support system. *Research on Aging*, 1, 434-463.

Cantor, M. H. (1991). Family and community: Changing roles in an aging society. *The Gerontologist*, 31(3), 337-346.

Coulton, C. J., Dunkle, R. E., Goode, R. A., & Mackintosh, J. (1982). Discharge planning and decision making. *Health & Social Work*, 7(4), 253-261.

Hagestad, G. O. & Herlofson, K. (2007). Micro and Macro Perspectives o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nd Transfers in Europe,” Retrieved January 14, 2012, from [http://www.un.org/esa/population/meetings/EGMPopAge/EGMPopAge\\_17\\_GHagestad.pdf](http://www.un.org/esa/population/meetings/EGMPopAge/EGMPopAge_17_GHagestad.pdf)

Johansson, L., Sundström, G., & Hassing, L. B. (2003). State provision down, offspring's up: the reverse substitution of old-age care in Sweden. *Ageing & Society*, 23(3), 269-280.

Lin, J. P., & Yi, C. C. (2019). Dilemmas of an aging society: Family and state responsibilities for intergenerational care in Taiwan. *Journal of Family Issues*, 40(14), 1912-1936.

Lin, J. P., Yu, C. W., & Huang, C. H. (2021).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their impact on preferences for meeting future care needs among middle-aged and older adults in Taiwan. *Ageing Families in Chinese Society*. Routledge, 234-250.

Maloney, S. K., Finn, J., Bloom, D. L., & Andresen, J. (1996). Personal decisionmaking styles and long-term care choices. *Health Care Financing Review*, 18(1), 141.

Motel-Klingebiel, A., Tesch-Roemer, C., & Von Kondratowitz, H. J. (2005). Welfare states do not crowd out the family: Evidence for mixed responsibility from comparative analyses. *Ageing and Society*, 25(6), 863-882.

- Parsons, T. (1943). The kinship system of contemporary United States. *American anthropologist*, 45(1), 22-38.
- Peek, M. K., Coward, R. T., Peek, C. W., & Lee, G. R. (1998). Are expectations for care related to the receipt of care? An analysis of parent care among disabled elders. *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: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*, 53B, S127-S136.
- Pinquart, M., & Sörensen, S. (2002). Older Adults' preferences for informal, formal, and Mixed support for future care needs: A comparison of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. *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*, 54(4), 291-314.
- Reinardy, J. R. (1992). Decisional control in moving to a nursing home: Postadmission adjustment and well-being. *The Gerontologist*, 32(1), 96-103.
- Silverstein, M., & Bengtson, V. L. (1997).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nd the structure of adult child-parent relationships in American families. *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*, 103(2), 429-460.
- Street, D., & Cossman, J. S. (2006). Greatest generation or greedy geezers? Social spending preferences and the elderly. *Social Problems*, 53(1), 75-96.
- Tepe, M., & Vanhuyse, P. (2009). Are aging OECD welfare states on the path to gerontocracy?. *Journal of Public Policy*, 29(1), 1-28.
- The Economist (2014). Abillion shades of grey. Retrieved from <http://www.economist.com/leader/2014/04/24/a-billion-shades-of-grey>
- Wielink, G., Huijsman, R., & McDonnell, J. (1997). Preferences for care: A study of the elders living independently in the Netherlands. *Research on Aging*, 19(2), 174-198.